

六零年代台北之春人文誌  
第二年寫作計畫  
創作成果自選部分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19 年第二期常態補助

文學類創作項目

申請人：丘延亮

(四十二) 文學是被「船長事件」給「純」起來的！

自從分別回顧了四、五、六十年代幾方面文化人被糟蹋及虐殺的舉例，我尤其心神不寧地被纏繞在與楊渭溪老先生（時年六十多了）在景美看守所那場異樣不類的邂逅，其點點滴滴之縈思中。同時，我也愈發不解當局煞費周章地在白克被殺多年後，揪出他的副導演、殷實有才的演劇人來對付，到底是 有什麼必要呢？這樣的魯幹、瞎幹真的對蔣氏父子有益、或有助嗎？猶有進者，十八個特務單位爭相拚功，以維持自身存在必要的製造事端，以虐民為己任，搬這些石頭到底是砸到了哪一位主子的腳，還迫那腳的主人忍痛而不吭聲呢？

國民黨在六十年代前後，自蔣介石抵台之日起的搜捕及屠殺，其中直接牽扯了逾十萬受害的百姓，這些血腥與其「肅清反共基地」的「成效」相比，又是怎樣的危機下的恐慌行為，只受到小腦投射所促使的呢？其「過份」又是到了什麼程度的「超殺」(overkill)？其不成比例的造業，除最終為自己埋下被逼退出歷史舞台的終結，又能有其他後果嗎？

蔣氏父子竟全無自知之明，只能任由其手下的惡棍競相明為「獻忠」，實則挖牆腳、掘墓穴的行為嗎？

其中蹊蹺之處，除了血跡斑斑之外，也滑稽到甚至於要叫卓別林也噴飯的程度，也成為了一部部令人窒息與落淚的卡通連環劇。

要理解這些近乎超現實的悲劇，似乎要求各輩之倖存者及後人有更冷靜與理智的切入歷史真實的能力，有能力進行異於國共黨爭或藍綠對峙的二元化閱讀，可以避免為了羅織罪狀而誇大暴力血腥的「功用」或「效能」。或只見到它企圖「噤聲」及製造恐怖的行止，卻見不到它們的有限性及反作用促生能力了。如此，除了產生為公務員惡棍之愚行辯解與增能的效果外，只能造成遺屬之楚囚對泣局面，忘卻先人們的理想主義及人格立身。是故，我們必須要針對各式特務們（特別是在文化事務方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特異功能有所解構。

為了踐行以上的認知，首先需要確定進一步讀史的策略、位勢及政勢 (politics)，下面幾篇只好跳躍時框，縱走式地回顧幾個巨大且突兀的文化屠夫們戕害人心，泯滅是非其意識的錯殺、超殺案例。

1951年9月，國民黨中常委、蔣介石官邸出身的王惕吾接任王永濤創刊的《民族報》，1953年，邀了《經濟時報》的范鶴言、《全民日報》的林頂立組成了三報的聯合版，集中辦公及出刊，四年後正式改名《聯合報》沿用至今。

林海音和先生（夏承楹，筆名何凡）1948年回台，她是1918年在日本出生的頭份客家人，四歲隨父到北京，在那兒住了26年。從廠甸附小讀到春明女中，17歲畢業進入北京新聞專科學校，隨即去到《世界日報》當記者。她的這個背景和出身端被視為是有代表性的「半唐山外省人」（俗稱為「半山」）。她的丈夫夏承楹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國語日報》社社長，因此她順理成章地於次年（1949年5月）被聘為國語日報編輯，並主編其週末版，直至1953年受聘為聯合報副刊主編，並開始兼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世新大學的前身）的教師，時年三十有五。

林海音接掌「聯副」時，何凡是總編輯及主筆，當時的「文壇」上（如果真有所謂的文壇的話），正是反共小說的全盛時期。蔣氏父子著陳誠重奪台灣為「反共基地」後，「痛定思痛」之餘，除了強化武力、殺戮「共諜」之外，得出結論認為是「宣傳太差」乃至於「失去民心」，一敗塗地至於眾叛親離至如斯田地。而今補救之道就是把握重建宣傳機器，強勢推行「反共文學」與「戰鬥文藝」。此「反共文學」與「戰鬥文藝」顧名思義，講的就是共產黨之壞以及反共之無可爭議，文藝為此而生而行，其所以為事必以給最終的反攻滅共目標作出思想和宣傳上的貢獻。

「反共文學」當局在強推出成群作者之時，密切管治其（政工）隊伍務必切實呼應政策的一言一語。為了維持這個文藝（政工）隊伍，有黨部，有組織小組，有政工學校，在行政命令下發放獎金及稿費，促其佔領文字區塊，也試圖產造此一特殊文字區塊的讀者群。於是國民黨掌控的官方媒體和文學雜誌遂紛紛以「反共抗俄」作為優先題材，爭取官方支持這類作品。

然而，短短幾年下來，文壇周邊的有志之士對此風氣已深深感到不耐，對作品的制式及貧乏更是有目共睹。除了在在對此種文風的敗壞無言以對，更感到其布爾什維克文藝政策下的苦悶，以及其結構性地對省籍結構所固有的姑息與暗助。

在此之際，林海音以她特殊的出身與人脈出掌「聯副」，遂有了尋求出路的機會、必要及可能。

作為一個回歸台灣祖家的客家籍貫文化人，林海音和夫婿可說是無黨無派、無宗教信仰的自由職業者，林海音的北京成長經驗令她在文學方面眼界較高、識見較廣、心胸也較開闊。她自認是個「自由派」，而在反共大業及白色政治下，她恐怕最在意的是她自身投身文藝的純粹與初衷，她自稱對政治「不感興趣」，執著副刊以其「文藝」為理念。當然，其編輯方針必與一切皆以服膺黨國需求為原則的偽文藝宣導，在旨向上頗相不類，不少論客在多少年後稱她「將副刊由服從

國策指導的附屬地位，提升到強調創作自由的發表場域，她藉由引渡現代詩、翻譯西方文學作品，進一步重塑本土的純文學範式，來反抗國策的主流書寫」云云，這個評說倘非別有所指地溢美之詞的話，也不免是歷史的倒證，論者無非是事後有先見之明地在自封孔明吧！

無可諱言的是，林副刊主編確曾採用了大量寫作新手的作品，也為他們在寫作生活中打開了發表之門。他們中持之以恆者終有不少日漸成就了文名，林副刊主編當然算是盡到了一個好編輯的責任。在她這個盡責中，特別可以注意的是，她鼓勵停筆多年的日治時期作家重新寫作，也幫他們提升中文書寫的寫作能力，這些皆可說是她的敬業表現。至於黃春明說她「在文壇像一個慈母，為作者改稿子，寫信鼓勵他們，也常常約大家一起吃飯，充滿母性的溫暖……」斯情斯景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在林海音任副刊主編這段時期內，從 1952 到 1961 被蔣介石逼迫擔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始終不肯放棄他自任為文藝總管的身份職責，不甘心只作為官僚的他，畢竟拋不開作為文化人的出身，在「反共文學」與「戰鬥文藝」的施虐下，他未放棄對其中被糟蹋的詩人、畫家、作者表示同情，他更不同意將他們的創作加以牽強附會的指控。他遂於 1961 年 12 月由其一干愛將召開了「中國文藝協會」主持的企圖破譯現代詩、現代畫有無秘藏玄機或暗碼的一連七次研討會。會後「中國文藝協會」將發言紀錄發給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教育部、新聞局，甚至行使意識形態公安職能的「警總」等單位，供其「參考」！

他們提出這有份量的記錄表明了張道藩這個國民黨元老，歷來的文藝活動領導人，終於挺身為現代藝術和藝術家的辯護狀背書。回顧這段公案，若干文藝史家後來發現六十年代初當局對「現代藝術」的短期寬鬆，這份文件似乎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就在這「寬鬆」聲中，1963 年 4 月 23 日，聯副刊出了一首題為〈故事〉的詩歌，作者署名「風遲」，詩歌諷刺一位「愚昧無知」的船長，漂流到一個小島上，滯留十年，財富慢慢用罄，被一位美麗的富孀吸引而流連忘返。

豈知警備總部「當局」一見，幡然大怒，認為此詩「影射總統愚昧無知」。其實，報社編輯部本來就有警總的縣民，報館又有「人二室」，對所有工作人員都在暗中做偵防調查，編輯同仁每天工作都十分小心，不然就會被捉小辮子。

警備總部「當局」立即將作者王鳳池以「叛亂罪」收押，認為其筆名「風遲」乃「諷刺」之意。報社上下大為恐慌，如地震海嘯來臨，層峰令社內「自行解決」，卻不准林海音為此負責提出辭呈，相反地，要在勒令辭職下立即交出副刊編輯位

置。

林海音匆促離開報社，辦公桌上還擺著幾篇待發的七等生的稿件。

林海音及夫婿在二二八之後才來台，且在大陸時也從未有任何「通匪」的交往或前科，十年的編輯成就既然因她登稿的出發點不是政治與文學的共相關係，又憑了她與作家們的公開合作與親和，她在文壇上成為了有極高知名度的女作家及編輯。她和夫婿立即在勒令去職下避禍走人了事，結束了「聯副」的十年歲月。

而林海音本人對此事也至死諱莫如深，從未公開提及，唯一私下的言談中所及的，是對鍾肇政談到了「吞下眼淚是什麼滋味」。她的夫婿何凡也只有「在那個時代，這種事可大可小，能平安解決就很好了……」寥寥數語言及。

揆之當年的蛛絲馬跡，林海音被迫離開「聯副」消息傳出後，文壇及新聞界才真是感受到了大地震的震波，她的作者及文友紛紛自問：「是我惹她闖禍的嗎？」連遠在香港的徐訏也來信詢問關不關他的事。幾乎每一位聯副的作者都如拷問般地質問自己的文字與作品，生怕是自己的不經意，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為林海音帶來了政治災難。

別的不談，自此之後台灣的報紙副刊一率謝絕刊登任何的詩作，自我審查及噤聲竟達十三年之久。1999年由官方出版的七大卷《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中也竟連王鳳池的名字也找不到！？

三十六年之後，林海音的女兒夏祖麗為了給她作傳，自澳洲回台搜集資料，以便撰寫《從城南走來》，她悉知當年「船長事件」中的作者風遲一心望能親自向「林先生」致歉，祖麗遂要求與王鳳池見面。

祖麗與王鳳池見面，王立即負荊請罪。

原來當局始終找不到他有任何與「共匪」有關的紀錄，但仍關了王鳳池三年五個月，五年後王鳳池才到中學教國文至 1988 年退休。

祖麗問他為什麼會寫那首詩，他答：「我少不更事，不知避嫌呀！」。而此詩之啟作則緣於「當時讀了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有感而作」，豈知，連累「林先生」去職，坐牢三年，三十年來自感罪孽深重，午夜夢迴時仍望有所補過」。祖麗回他，母親從來沒有怨恨過他。「唉！」王鳳池嘆了一口氣：「我對不起林先生，百身莫贖啊！」

然而，這真是王鳳池的罪過嗎？

儘管如此，世事畢竟難料，歷史中也不至於被一千公務員身份的文藝加害者，以他們的血腥之手加以扼殺，或予以阻止或改變。

林海音退出「聯副」後竟意外獲得了自由之身，不久後就成立了她的「純文學」王國，幾年來雜誌出版蒸蒸日上，成為台灣文化界的明星與出版重鎮。林及夫婿都一再向友人表示，倘非 1963 年的「飛來橫禍」，他們是不會有自行創業的想像和機會的。在這個詭異的歷史時空的轉捩點上，國民黨特務的無聊舉動竟也顯得不再是那麼百分百的無聊了！

而台灣的文學也就此「純」文學<sup>1</sup>了起來，在壓制持續下走上了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的「純吃茶」之奇幻美學之路。<sup>2</sup>

---

<sup>1</sup> 「純文學」在我這一代人中，其實真的不是一個體面的詞語。首先他來自「純吃茶」，而純吃茶指涉的我這一代在台灣的心理脈下當然是不「純吃茶」的，早已存在的「茶室」（或特約茶室）文化。對我這一代少年言我這一代它我這一代嫖妓前的性教育場所，我這一代所謂的摸摸店的所在，去「打排球」（摸奶子），或被女服務生幫助自慰。而純吃茶的所在，「純」說的則是自己帶女朋友去「吃茶」，進去進行戀愛及愛撫行為的地方。

<sup>2</sup> 有論者言林之被妒乃因為她多採用了台籍作家之故，這點無疑是以小人之心理度國民黨小人之腹的想當然耳，無的放矢。至於她是否也因持續採用政治犯來稿而為當局注意，這點還需要多方探究與考察，祖麗書中提到的楊蔚只是那些人中之一吧！

#### （四十四）永遠有擔當的副刊編輯

在半個世紀後，回觀 1968 年入獄經歷之種種，每每詫異於這個身處於壓抑與隔離的特殊時空裡的自己，其感知與識見所暴露於其中的向度與意義結構殊為特異。在那裏面，空間不是連續的，時間也不是線性的，四方八面迂迴曲折的聲／形其映示的認知通道中，浮沉其內所承載的信息來去無蹤、卻恆常再現。它們即使在我出獄後仍在不意中突襲人心，使它無以釋然，懷之難以言說，卻又不吐不快。這個地層下的知識蛛網，纏繞著無數人的血淚，卻也映現了其外世界無以得見的良知，其中之一就是要講這個永遠有擔當的副刊編輯的故事。

面對景美軍法看守所「仁愛樓」左翼二樓的一列囚室中，我的押房是倒數第三間，爬上一人多高的氣窗，隔了多重鐵柵向外望，可見到據說是給犯人們「放封」之用的內院，而我於在押的一年半中，被「放封」的經驗只有兩次，兩次都發現水泥地很乾淨，一顆「被遺忘」的棄置菸頭都未能發現。

一年半中的頭幾個月，在水泥氣漫天的烏煙瘴氣中的夏日裡，我被搬遷多次，也染上了驚人的皮膚疾患，每天要用消毒水沖洗下身。及至天氣稍冷，接著我就被搬入倒數第三間（忘了，或從來沒有注意過房號是甚麼），就沒有再被搬遷過，只是有不不斷的各式來人出出入入——除了賣「紅露酒」（即軍用汽油）的軍人罪犯及精神有問題的老兵、逃兵等，明顯是被派來擔任「特殊任務」的閒雜人等外，大多是審訊中或已被判刑（除死刑犯被關在一樓獨居囚室）的各式政治犯或共匪同路人——即官方欽定的叛亂份子。

在這個人來人往的邂逅中，我首先遇到的人中有第二次涉案被白色檢控的朱傳譽，見到這個我景仰的童書作者我是驚喜參半的，他沉默寡言、獨行自理身邊一切，很少與難友交結。不久，得知他的妻子在外生病，心情極為惡劣，但在眾難友悉心安慰及照顧下，他也日漸開朗，偶爾在他力撰的辯護狀書寫的苦鬥中抬頭，也和我聊上了幾句。他跟我小學老師席淡霞都是上海中國新專畢業，也同樣被捲入 1957 年美新處被砸後的林振霆一案中，至於被教付管訓三年。1961 年管訓後回到 1949 年入職的「國語日報」任專欄編譯，並由林海音介紹入世新新聞系擔任講師，撰寫兒童讀物。豈知，1967 年 12 月他又被人檢舉，稱其主編的《中國文選》用了 1940 年《新華日報》魯紫銘（雨亭）的〈吾教子之願償矣〉一文，1968 年 5 月被調查局逮捕，成了我的難友——其後軍事法庭以「以文字為有利叛徒之宣傳」為由，判了他三年六個月，出獄時妻子已經過世。

由於我之認同席淡霞老師的緣故，朱傳譽開始對我戒心稍少，在發現我的文學休養後，我們從《國語日報》的兒童文學談到新生副刊，也談到了印刷精美的新

生兒童周末附刊，當中也一再提到了從事兒童文學編輯的那個姓「童」的副刊編輯：童常（童尚經）。

過了幾個月，我們的押房突然來了個傳頌多時的大人物，他叫路世坤。這個中年男子短小厚實，面色黧黑，一臉幹練的沉穩，絲毫不見有任何多次、多年牢獄之災的印記，其中的秘訣似乎在於他天天帶著難友們，群起運動、一天至少三次的緣故。

即使在老報人中，路世坤也是資歷頗深的一員，他 1947 年初來台即擔任剛改組的《新生報》編輯組主任（從他那兒我知道了同一年稍早童尚經已擔任資料組組長），他而後改調地方新聞主任（姚勇來則是他的副主任）。十年後，1957 年他在「福建幫黃爾尊案」中受到牽連被判刑八年，後被吸收為調查局雇員，協助偵訊，刑期減少為五年。又十年後，1966 年因調查局的內鬥，蔣經國派的、軍統出身的局長沈之岳欲整肅老中統派，直指特務頭子蔣海溶（調查局第三處處長）、李世杰（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指控他們曾參加的「福建省抗敵後援會」乃中共地下組織，由之炮製了「城固專案」，此案除了牽連曾因「羊棗事件」入獄而被蔣海溶吸收的沈源璋（化名林小書）及夫婿姚勇來外，路世坤再次受到株連，又被送到看守所「協助辦案」，及至最終又被判十五年監禁。

路世坤江湖老道，儘管日常並不多言，仍偶爾在言談間透露出些許少為人知的秘辛，在他搬走後，押房中其他人各自所知拼湊，押房中的我們對於 1966 年開始的新生報大整肅，及樓下蔣海溶、李世杰被長期暴虐對待的事都多少有了相當清晰的眉目。至於聞說沈源璋在審訊中被虐待致死，但仍不肯咬住蔣海溶的情節，不同的人除唏噓之外，多有不甚相同的感受。

我第三次在獄中和童常發生的超時空邂逅則是被派到外役區後，由同案的吳耀忠媒介而發生的。

在外役區近半年後，所方開始在圖書室的門外豎立了一個壁報板，上面每天（或最起碼勉強可說是每天）在上面貼了《中央日報》，據說是要大家關心「國家大事」。然而有趣的是，所方認為是屬難友認為有趣、關心的「國家大事」都被政戰室的政戰官小心地用剪刀剪去，「每天」都張貼的是大大小小的「開了天窗」版面。不久，大家都匆匆去「看報」，數一數天窗的大小和多寡，只要大了、多了就不由感到興奮或欣慰，認為雖不知被禁的是何事、何物，然而，只要怕難友知道的事就是「有事」！換句話說，天窗＝有事＝好事，壁報的「功能」也就不算是完全徒勞無功了。

而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也只剩下了零星口傳的傳奇了。更有趣的是所



有的副刊文章或漫畫都一概不見出現。耀忠和我談起此景遂一再點出入獄前的新生副刊讀者鼎盛的狀況，因為他是畫畫的，他也就不仅一次提到了劉興欽的作品，談及劉曾出事，新生副刊的童主編不但未疏遠他，卻一再栽培並予鼓勵他的往事，令我印象深刻。

和耀忠談著談著，不意接到家人成功送進來的一本虞君質寫的《藝苑精華錄》，一打開書就見到謝誌中提到了作者在童尚經的敦促及鼓勵下才連年完成了專欄連載及出書，至為感佩云云。因為耀忠知道我媽媽的沙龍中虞伯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故在我倆的心目中更增加了這個又叫童常的童尚經的景仰。

哪裡知道，就在耀忠和我談起童尚經編輯的時候，新生報的大整肅又有了驚人的發展，而童尚經本人也在 1970 年就被囚禁在我們離開的押房，每日受到非人的暴力逼供，無盡摧毀身心的虐待……，及至於到了我離開景美看守所的次年，1972 年 8 月 26 日被押出槍殺，結束了前後八百多天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慘無人道日子。

童常，本名童尚經，1917 年出生，江蘇鎮江人，鎮江初師畢業即因家境不濟輟學，旋在上海申報圖書館工作，接受到上海進步文化人的思想洗禮。1936 年抗戰軍興，時年未及 20，應新安學園的號召參與了「新安旅行團」，往西北大漠及西南勞軍並宣傳抗日，「新安旅行團」在國共合作抗日退色後，國民黨拒予支持，改由中共資助，遂在四〇年代後被定性為左派組織，繼續各種抗日文宣活動，利用演劇、出版等方式支持各種抗日活動。

抗戰勝利，1946 年 9 月童尚經偕妻子來台，他倆認為這個新天地未受汙染，可以建立新的人生，一心為新中國希望的新天地台灣投身文化復振。初為貿易行工作，次年即轉入新生報，擔任資料室主任。同年秋新生報改組由蔣經國人馬謝然之接掌，在二二八後白色恐怖的風風雨雨中，置身於極為保守的報，童常小心謹慎、安穩工作了十年，未被波及於 1957 年新生報第一次大整肅，是次同事路世坤被捕。

再約十年，1966 年新生報第二次大整肅，沈源璋屈死獄中，姚勇來改判十五年外，姚明珠（姚勇來的妹妹）及妹夫薛介民則被處死，禍仍不及童常。及至 1969 年單建周被迫「自首」，隨即自殺，新生報同事徐雪影為保命「自新」而供出童常，當局即疑他曾在四〇年代參與共產黨。新生報安全室遂立即盯上了作為副刊編輯十幾年，成績斐然的童常。

1970 年 2 月 8 日，台東泰源監獄人犯越獄失敗，鄭金河等五人同年五月被槍斃，童 5 月 8 日正式被捕，從此八百多天日日刑求逼供，直到 1972 年 8 月 26

日被槍斃，他應該是最後一個被執行政治性謀殺的文化人。

童常被虐待逼供了兩年多，但從未供出任何可資特務「擴大戰果」的被牽連者。當局無奈，乃改以文字獄手段羅織罪狀。事緣 1959 年 10 月，童常因美國萬聖節來臨，翻譯了《讀者文摘》一篇談靈異的文章應景，以〈鬼節〉為題發表。豈知出刊之日 10 月 31 日恰為蔣介石生日。特務抓到童這個「小辮子」大做文章，誣他誣譏元首、詆毀時政，「罪不可赦」，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揆之史實，蔣經國一系的調查局鷹犬之到了七〇年代仍執意加害童常，其司馬昭之心，早已歷歷在目地銘刻在對他的起訴書、判詞及提供的證物之上了。在他被誣的案牘中，特務就整理出了六十幾頁十行紙，記錄了五百多筆童常在 1968~1969 兩年中每兩三天就刊登出的政治犯投稿，其中有不少就在泰源監獄，特務就用這些「資料」作為他「救助左翼同路人」的罪證。

警總認為他是共產黨才會同情獄中的政治犯，鼓勵他們寫作，為他們解決生計。警總的造冊中列出他們投稿日期、文章標題、作者姓名等，多達好幾百人。這個規模（即令只顯示在兩年之中），政治犯讀書、翻譯、寫作之餘投稿，也足以證明童常「以稿費資助政治犯」了。（然而，在「囚情」穩定時期的泰源監獄，投稿的政治犯除了投給新生報，投到聯合報的也不少，甚至也有投到中央日報副刊的。）

以上的情狀，許昭榮、謝聰敏的文字中早有提及，明言童常作為新生報的副刊編輯確曾對謀生不易的政治犯助益極大。但是台灣的文學界及迄今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學者對這段歷史及其中上百位作者的不聞不問，對童常／童尚經的其人其事只見張系國在中時部落格題為〈最後的副刊編輯〉的紀念短文，此外，隨後童小南（童尚經的女兒）1999 年在痙弦鼓勵下撰寫回應卻被壓稿，最後只好在海外《北美世界日報》2001 年 10 月 21 日刊出的五篇獨立章節。童常一生的奮鬥與軌跡至今未見任何研究或嚴肅文字，這絕對是台灣文化界的損失，不是童常這個一世耿直為文、護義助人者的悲哀。

童尚經對文字工作的熱忱、對知識之尊重、及對作家之愛護，恐怕也只是他人格外現最為人知的部分。只要有過坐牢經驗，或被特務鷹犬凌虐過的人，都應該知道，他在嚴刑逼供下拒絕牽連任何人，他的英勇確實不是常人所能及，必須有極其高超的道德良知，才能加上他那幾乎令人匪夷所思的堅定和毅力才能成事的吧！

張系國的短文中提及他曾問童尚經，擔任副刊編輯最難的是甚麼？童笑著說了四個字：「要有擔當」。

偉哉斯人始有斯言。

是的，我們見到是一個「人」，一個永遠勇於擔當的副刊編輯。